

<<民国元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民国元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4102369

10位ISBN编号：7224102369

出版时间：2012-8

出版时间：陕西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颜浩

页数：321

字数：254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民国元年>>

### 内容概要

在政治剧变的年代里，百姓或惶惑迟缓，或跃跃欲试，日常生活依然在传统的轨道上缓缓滑行。

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怎样变迁，大时代中个体遭际与命运如何？这是写作《民国元年：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》时所面对的议题。

与其他著作不同，本书把文学引入历史叙述，细腻展现“民国元年”这个历史切片中的民间日常生活——男女、衣着、娱乐……

改朝换制的困惑，乱世飘零的艰辛，新旧道德的碰撞，岁月沧桑的感慨，文学叙述构建的空间对此往往表现得更有质感，拥有更多的历史细节。

贴近变革时代日常生活的“现场”，回到那一个个曾经有血肉和呼吸着的普通人中间，去体会他们的忧惧、喜悦与悲伤。

## 作者简介

颜浩，1975年生于湖南，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获文学博士学位。  
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  
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、美国柯盖特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。  
出版专著《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：1920—1928》，主编《新文艺和文学遗产》、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》等。  
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“五四前后北京的文化生产与新文学的传播”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生态与文学转型研究”等多个科研项目。  
近年来主要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、城市文学与区域文化、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等研究领域。

<<民国元年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家国

- 第一节 摇摆的月份牌
- 第二节 太后的葬礼
- 第三节 中华门与双十节
- 第四节 谁敢自言满族人

第二章 社会

- 第一节 城墙下的自治
- 第二节 报纸的盛衰
- 第三节 教科书革命

第三章 男女

- 第一节 结婚雅尚半文明
- 第二节 休夫与弃妻
- 第三节 英雄大闹参政权
- 第四节 坤角登台满院芳

第四章 衣履

- 第一节 被绑架的辫子
- 第二节 男儿喜改装
- 第三节 女子身上衣
- 第四节 始于足下的解放

第五章 娱乐

- 第一节 游公园
- 第二节 吃大菜
- 第三节 看影戏
- 第四节 读小说

后记

## &lt;&lt;民国元年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公元1912年1月1日，礼拜一，阴历十一月十三日，辛亥年庚子月丙子日。晚上十时，南京，两江总督府大堂。穿着大礼服、头戴大礼帽的孙中山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同样装束的胡汉民。门外五色旗飘拂，军乐队齐奏欢迎曲，肃立两旁的新军第九镇士兵托枪敬礼，二十一声礼炮同时鸣响。

正中的礼台上有些简单的装饰，但灯光不太明亮。孙中山走上前去，面南而立。左边是秘书长胡汉民，右边是各省代表会议主席景耀月，江苏代表袁希洛站在礼台的左侧。仪式开始。孙中山举起了左手，宣读莅任誓词。誓词篇幅很短，但他读得有些吃力，他的国语实在不怎么好。好不容易将誓词念完，接着是景耀月代表独立的十八省人民，向孙大总统授予玺绶并致授玺辞，胡汉民代表总统宣读答词。本省代表袁希洛随后上前交付大总统印，孙中山再转交给胡汉民，启用印信，在就职宣言上盖章。就任程序完成，掌声响了起来，台上的几个人互相握手致意。孙中山上前几步，开始了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一次演讲。这次他说的是广东话，语速明显比刚才读誓词时流畅。但从听众们的表情来看，他们大多没有听懂。好在他的演讲并不长，很快便鞠躬致谢。台下民众三呼万岁，军乐队再次奏乐，典礼就此结束。已是夜里十一点了，一个叫戢翼翘的上海代表随着人群走出大堂，心中着实困惑。临时大总统刚才的演讲他一句也没听懂，也不明白为什么就职仪式会如此简单，甚至有些草率。更不理解为何孙先生一定要选在晚上就任，难道他不知道整个南京都没有镁光设备，夜里根本无法照相吗？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却没有一张照片保留下来，岂不令人遗憾。同一时刻，陕西代表马步云也兴奋地走出两江总督府的大门，现在应该改称它为临时大总统府了。马代表一个月前就来到南京，全程参与了各省代表会议的激烈讨论，在就职典礼之前，还到总统府来帮忙杂事。现在任务完成，自然心情格外欢畅。这一天皓月当空，马步云和其他代表结伴步行回三牌楼的江苏省谏议局。深夜的南京街头，寂静无声。有同行的代表耐不住了，大声提议道：“我们今天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，建成了民主共和国。这样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喜事，不能不踊跃三百，热烈欢呼！”江西代表赵士北立即响应，飞快地跑到人群的前边，高声喊起了口号。其他人也跟着欢欣鼓舞了起来，边跳边叫，一路高歌。沉寂的夜幕被打破了，远处有狗叫声传来，沿街住户的灯影影绰绰地亮了，显然是被叫喊声所惊醒。有些人家的门悄悄地打开，漏出一线灯光，应该是有人披衣起床，从门缝向外窥伺动静。但很快地，那一线灯光又消失了，没有人有胆量站出门去观看。刚经历过战乱的南京人可能在怀疑，这叫喊声是被打跑的张勋又派了散兵游勇来滋事。那些江防营辫子兵的首级还在南京沿路的树枝上挂着，街巷里还堆着死尸，谁知道张大帅会不会杀回来报复呢？即使不是乱兵来骚扰，万一遇着剪辫队来抓人也不得了。听说为了大总统要上任，这两天剪辫队正强迫革新，满大街地搜寻辫子，见着就剪，便是跪地求饶也不能幸免。

## &lt;&lt;民国元年&gt;&gt;

有人将辫子盘在头顶，藏在帽子里，也还是被发现后一刀剪去。

一天之内，南京城就不知添了多少光头。

这条辫子是该剪还是该留，谁心里也没底。

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又是半夜三更的，还是关上门少惹事为妙。

而这个时候的临时大总统府里，孙中山正忙着将各省代表和外国嘉宾一一送出大堂。

各代表请总统留步，孙中山答曰：“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，总统是人民的公仆。

各位是主人的代表，礼当送至阶下”。

众人点头叹服，在阶下与总统握手而别。

离大堂不远的正厅里，随同孙中山从上海赶到南京的任鸿隽，早已进入了梦乡。

这位新任的总统府秘书，因为坐了一整天的火车，感觉非常疲倦，吃完晚饭后，和几位朋友闲谈了一阵，倒头便睡了，根本没有参加大总统的就职典礼。

同盟会的两位大佬居正和宋教仁，即将走马上任的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和法制院院长，也没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。

他们俩迟到了。

但这真不能怪他们，都是一群女人闹的。

本来居正早早地就赶到了宋教仁住的龙公馆，邀约他一起去参与大典。

没想到刚要出发，却被女子北伐队队长林宗雪率领女兵挡住了去路。

林宗雪手按佩剑，要求宋教仁答应赋予女子完全参政权，否则便不让他们出门。

好说歹说，纠缠了许久，女英雄们都置之不理，焦急的宋教仁忍不住大声说道：“大总统今日就职，你们不去排班护卫，已经失礼，向我要求，更是无理取闹。

快去总统府，高呼万岁！

”听得他如此说，林宗雪冷笑几声，转身率队离开，两位焦头烂额的先生这才匆匆赶往总统府。

到了地方一看，就职典礼已经完成，现场早就人去楼空，两人的心也一下子变得冰凉。

好不容易找到胡汉民，见面便询问二人为何来迟，少不得要把女将堵门的狼狈情形说与他听。

宋教仁余怒未消，愤然说道：“她向我要求参政权，岂不好笑！

”胡汉民则以调侃回应：“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，龙公馆不比此处快活得多么？

”三人相视而笑，握手称贺，共祝革命大业成功。

女人们要参政权这点小麻烦，自然不再放在心上。

安心睡了个好觉的任鸿隽这时已经起床，他刚刚才听说，孙先生已经在半夜里就任了，同时还颁布了改元改历的命令，就职日便是新年的元旦。

曾经感到困惑的戡翼翘也在第二天明白了过来，深夜里匆忙的就职典礼，就是为了赶在元旦这一天易正朔，改用新历。

中午时分，刚出版的上海《申报》和《民立报》由火车送到了南京。

两张报纸的头版都用了大幅标题，恭祝“中华民国万岁”和“孙大总统万岁”。

然后便如往常一样登载各种八卦消息，嘲笑北京的满清政府，如监国摄政王的福晋穷奢极欲、内务府大臣奎俊贪恋女色、贝勒载洵收受贿赂等等，呼吁清廷认清形势，和谈尽早成功。

而在被嘲讽为“歌舞漏舟之京师”的北京城里，国史馆前总纂恽毓鼎也在1月1日的午后走出了家门，到德意志、意大利和荷兰等使馆以及熟悉的外国友人处拜年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天是西方人的正月初一。

接着几天他的行程都安排得很满，参加了多个聚会，和友朋共话时局，痛骂主持南北和谈的唐绍仪通匪卖国，宗室亲贵们怯懦无能。

直到1月8日，他才知道孙文已经在南京“僭称总统，伪设行政长官”。

但他已远离政治中心，早就无能为力了，只有在日记中叹息“南省百姓已身受无君主之害”，深恨自己徒具一副忠肝血胆，其奈之何！

就在十天前的日记中，恽毓鼎还记载了一件从朋友处听来的怪异之事。

京西潭柘寺里有一棵樟树，相传颇具神力，每当有新帝要登基之前，这棵树上便会发出新枝，老枝条随即枯萎。

## &lt;&lt;民国元年&gt;&gt;

历历不爽，人人称其为帝王树。

光绪帝和今上宣统帝入承大统前，均是如此。

不料今年，这棵帝王树的老根之上，突然长出一根旁枝，与代表今上的新枝不相附属，闻者皆深感骇异。

如今看来，这根诡异的旁枝果真应验在了南京城。

郑重其事地记下这则异闻的恽毓鼎，其实已早有预感了吧？

这几天，住在上海的原湖南布政使郑孝胥，正为头上新长出的一个疖子痛苦不堪，夜不成寐。

他比恽毓鼎更早知道孙文被选举为大总统的事情，心知大局已定，王室已成虚号，但革党内部纷争不断，只恐短期内难求平静。

这位曾经主张新政的文坛领袖，心中也难免踌躇彷徨。

1911年12月31日，他在日记中写下了“霜重，弥望如雪”几个字。

是日夜里，上海下起了大雨，凌晨方歇。

晨曦初露，天空放晴。

一大早，上海车站的人行道上，已经排列好了两行沪军的士兵。

人人身穿新军装，紧握着步枪，每一支枪上都插着一面小小的五色旗。

九点多钟，穿着黑色西服、头戴便帽的孙中山走进车站，身后跟着任鸿隽和同盟会的几个朋友。

前几日为接见沪上各界代表忙得不可开交的候任临时大总统，脸上虽带着明显的倦容，仍然微笑着挥手致意。

但看到士兵们枪上插着的五色旗，他提议的青天白日旗却完全不见踪影，面上神色一凛，转身上了一火车。

这一趟专列因为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和军队迎送，所以开行得很慢。

到南京下关车站时，天色已经全黑了，各省的代表早在站台恭候良久。

专车停稳后，代表们纷纷登车，与孙中山一一握手寒暄。

专车再从下关入城，转轨进入都署车站停下，代表们拥着孙先生入两江总督府后花厅休息。

此时室内已经掌上了灯，代表们在花厅里等候，一边喝茶聊天。

有代表提议，各人写下自己的籍贯和名字，用总统印章加盖纸上，留作永久纪念。

大家都表示赞成，于是取来纸笔，各自书写盖章。

江苏代表陈陶遗因为送副总统黎元洪的当选证件去了武昌，不在现场，他的好友袁希洛还代替他署名盖印，以免因错过如此重要的时刻而遗憾。

十点钟左右，有人走进了花厅，恭请代表们去大堂参加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。

大家相继起身，整顿衣帽，神色肃穆地鱼贯而出。

这一刻，他们肯定都相信，自己正在见证历史。

从此以后，万象更新，眼前的世界将大不相同。

这之后的一年，以及一百年，确实有很多事情将要发生。

世界在改变，但也没有想像中那么天翻地覆，一往无前。

许多人很快感到了失望，甚至绝望，还有一些人则努力寻找新的道路。

他们找到了，或者没有。

不管怎样，1912年元旦的南京是一个起点，大幕已经拉开。

这一年，是中华民国元年。

第一章家国第一节摇摆的月份牌阴历的腊月除夕，是北京城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。

天一擦黑，穿着新衣的孩子们等不及，都拿着香火到家门外交起了鞭炮。

妇女们则在厨房中忙碌年夜饭，或者准备明日供神的煮饽饽。

只听得家家一片刀砧之声，邻里之间，远近可闻。

而街面上的商号和店铺，这一日则最为紧张。

按照规矩，买卖无论大小，都必须在大年三十结清帐目，开出清单。

有顾客拖欠赊账的，也要在五更之前讨回来，不然新年一到，就不便上门去要钱了。

“爆竹千声岁又终，持灯讨账各西东”，《都门杂咏》中的这句诗，说的就是北京大年夜



## &lt;&lt;民国元年&gt;&gt;

的古老习俗。

老舍的小说《正红旗下》对此更有精细的描绘：“街上，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。

胡同里，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，响成一片。

……在这一片声响之上，忽然这里，忽然那里，以压倒一切的声势，讨债的人敲着门环，啪啪啪，象一下子就连门带门环一齐敲碎，惊心动魄，人人肉跳心惊，连最顽强的大狗也颤抖不已，不敢轻易出声”。

好在铺户也是要过年的，到了后半夜，他们开始祭神，躲债的人家就可以坐下来吃顿团圆饭，围坐在一起熬夜守岁了。

等到天亮后一开门，新年就算是到了。

按照规矩，妇女们初五前不许出家门，只有男孩子能随着父亲四处去拜年。

如今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，挨门磕头拜年可是个技术活儿。

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梁实秋，对此还有一番并不愉快的童年记忆：“那时节拜年是向亲友长辈拜年为限。

这份差事为人子弟的是无法推脱的。

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上马褂缎靴，跨上轿车，按照单子登门去拜年。

有些人家“挡驾”，我认为这最知趣；有些人家迎你升堂入室，受你一拜，然后给你一盏甜茶，扯上几句淡话，礼毕而退；有些人家把你让到正厅，内中阒无一人，任你跪在红毡子上朝上磕头，活见鬼！

如是者总要跑上三两天”。

而苏州人包天笑也记得，他九岁时就代替父亲外出拜年，穿上灰鼠马褂的大人衣裳，坐着轿子一天跑了五十多家。

可见这种走马灯式的拜年礼俗，南北各地都相似，并非北京城独有。

上海竹枝词中还有“卓午出门归路晚，绕阶名纸拾梅红”的句子，意思是拜年也没必要非得进人家门，往门缝里塞一张名刺也能算数。

百姓人家忙着拜年度贺，而除夕夜紧张了一宿的商铺，这时候都关门休息了。

按照传统，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以备急用外，大大小小的买卖字号一律上了板，门口贴着梅红纸的歇业告示。

这几天戏馆子封箱不唱戏，连茶寮赌局都闭门谢客。

一直要等到初六，“破五”的饺子吃过以后，女人们才盛装出行，与亲朋戚友往来道贺，相约去赶会逛庙，或者到厂甸挤着看新鲜玩艺儿，新嫁的女子则在这一天归宁省亲。

各家商号也纷纷开门迎客，店东伙计一起喝顿开市酒，放挂长鞭迎进财神，宣布年节告一段落，新一年的忙碌日子开始了。

1913年的癸丑春节，也这么兴兴头头地过去了，和往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唯一有些特殊的是，这已是这一年里的第二个“新年”了。

一个多月前，中华民国刚刚庆祝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。

在老百姓的口中，它被称为“新新年”，以区别于传统春节的“旧新年”。

原本该腊月二十三就封印的官府，在“旧新年”里遵命如常办公；但在“新新年”那一日，则好好地热闹了一番：“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，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，相与悬旗结彩，脱帽鞠躬，欢呼民国万岁者，何等兴高采烈。

此数日间，大总统对于开国元勋，必有加恩命令，或则优赏，或则晋封，以粉饰此元旦纪念大典”。

南北统一，政府北迁，又适逢新年，原本应该大张旗鼓地庆贺。

可奇怪的是，北京城里并无多少过节的气氛。

除了少数店铺门前换了春联，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。

元旦期间，《大公报》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，民众对这个新年大多瞠目以对，“然起视人民，一若不知有新年也者，一若不知有元旦纪念也者”。

临近腊月了，北京人想的是随后而来的“忙年”，根本没有将官府定下的“新新



## &lt;&lt;民国元年&gt;&gt;

年”放在眼里。

以后在五四运动中“暴得大名”的曹汝霖，曾经是清廷的外交部副大臣，民元后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的议员。

1913年元旦庆典时他正在北京，并随同几个议员到总统府贺年，感受了一回握手、合影、签名的民主礼仪。

据他的回忆，之所以这个元旦在北京显得格外冷清，皆源于老百姓对新政的误解：“因内政部令警察总厅，晓谕人民，从今年起改用阳历，家户店铺应换春联，旧历除夕元旦不许放鞭炮等云，人民误会，以为改了政体，不许再放鞭炮，故元旦寂静无声，不若往年之热闹也”。

不过，与之后旧历新年一如既往的繁华场景相比，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元旦，过得确实有些灰头土脸。

在这个冷清的元旦，一个家住宣武门南、名叫恽毓鼎的中年人，特意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“新新年”的观察：“繁盛市场尚有年景，里巷故宅则寂寂无所觉也”。

这一天恽毓鼎的活动也甚是平常：会见了几个客人，和朋友商量的女儿的聘礼，晚饭后在灯下读了一小段《资治通鉴》，之后便早早睡下了。

极为平淡的一日，几乎没有什么新年的味道。

但一个月后的农历除夕，他的日程可就繁忙多了：“上灯时恭迎祖先神影，合家行礼辞岁，妇孺嬉戏甚喧。

……子夜焚香谢天。

晨起向阙行三跪九叩礼。

在至圣先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礼。

在祖先神像前行礼。

合家贺年。

午后至南横街拜二世父母神影，为三兄拜年。

……马车至昆师母（送年敬八元），陆师相（送年敬四元），四叔岳、五叔岳母处贺岁”。

即便与一般人家相比，恽毓鼎的新年礼仪也称得上繁复。

尤其是“向阙行三跪九叩礼”一项，民国之后已少有人行了。

但此人曾当过19年的清朝宫廷史官，有这套遗老作派并不奇怪。

恽毓鼎写日记的习惯由来已久，1912年春节过后，他开始在每天的日记上标注新历，并特意注明“为对于外人酬应计也”，显然只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举。

事实上这个久居京师的知识分子，对于元旦并不像普通百姓那般陌生。

从日记中便不难看出，前些年他曾数次在元旦这一天，赴外国使馆、兵营和熟悉的洋人朋友处拜年。

但在1912年的除夕守岁诗中，他写下了“忍见奠阶废建寅”一句，足可以看出这位前朝旧臣对“军民改用阳历”的敏感与不满。

所谓“建寅之月”，便是夏历（阴历）的正月，相传伏羲、神农之时，中国便已有了历法，以“建寅之月”为岁首，以后代代沿革，皆以夏历纪岁。

而民国元年新政府成立的次日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颁布了命令，“中华民国改用阳历，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，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”。

看上去沿袭了几千年的夏历，就要被这一纸通令宣告废止了。

朝代更迭的重要标志便是改元改历，漫长的历史早已让中国人熟悉了这套政治的把戏。

只是中华民国的方式有些不同，改的不是皇帝的年号，而是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历法。

以黄帝纪元为年号，这在武昌起义后便已出现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复汉反满，搬出炎黄始祖对抗大清皇帝，以彰显大汉族的正统地位。

这之后革命风潮扩散，时局瞬息万变，历法也一度陷入混乱。

有些宣告独立的省份也以黄帝纪元，有些直接追溯到孔子诞辰，有的则用同盟会天运年号纪年，称1911年为天运辛亥年。

孙中山回国后，立即发现了历法乱象实则隐含了革命势力各自为政的危险，“认为有改正期求统一的必要，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，援引公历，由元年以至亿万年”。

## &lt;&lt;民国元年&gt;&gt;

孙中山的解释是，废除皇帝年号，改用中华民国的国号纪年，既强调了新国家的共和体制，也便于百姓记忆。

援引阳历则是为了“世界大同”，便于与西方国家的商贸和外交往来。

废止阴历的理由也很充分，“预算年度，减少岁闰麻烦”。

但孙中山的呼吁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可。

在12月31日的各省代表会议上，“代表来往筹商各事，颇有争议”。

在关于“颁定国历”的议题讨论中，代表孙中山出席的黄兴提议改用阳历，并以中华民国纪元，“以新天下耳目”，然而“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持旧历者”。

经过几番辩论，孙中山依旧坚持，并威胁不通过该决议，便不到南京就职，“一时颇成僵局”。

最后以此在代表会议中讨论，始获通过；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的除夕，讨论至深宵才算决定，即连夜电复总理，并请即莅京就职。

如此大刀阔斧地破旧立新，的确显示出了新时代和新领袖的自信与作派。

不过普通老百姓可能只知道那一天是辛亥年的冬月十三日，并未意识到有别样的意义。

浙江人蒋复璁当时正在杭州读小学，学校要求很严格，规定晚上九点休息，进房即睡觉，不许聚谈和看书。

但十三日那天晚上，他的表弟前来看望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，被老师发现了。

第二天，他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批评，并准备给他记一个小过。

“正在谈论，忽然外面打来了电话，说今天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二日，昨天是元旦，改用阳历，放假一日”。

老师看在元旦的面子上，这个过便没有再记了。

因为有这么个小插曲，蒋复璁对于民国元年的元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但由此也可看出，即便是民风较为开放的江浙地区，对于“元旦”的概念也是较为模糊的。

为了使民众了解新历法，更为了确立“易正朔”的合理性，没来得及在元旦大张旗鼓庆祝的南京临时政府，决议于1912年1月15日补行庆典。

可中国人的习惯是名正方能言顺，这个不伦不类的庆祝日该如何命名，方能让百姓认同呢？

如果依据常理推断，既然元旦成了新年第一日，半个月之后便该是元宵节了吧？

果然，报纸上都在呼吁“大家来闹元宵”，15日那一天的所有庆祝活动依照的也都是元宵节的习俗。

上海各中学都放假一天，“本埠各公署与南北市华洋各商店及浦江所泊各国兵舰商轮，均悬挂灯笼，同伸庆贺，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停理谏政一天”。

入夜后一些城区还有提灯游行，引来无数路人旁观，声势可谓不小。

可老天爷似乎并不给新历面子，“元宵节”的夜晚天空没有月亮，毕竟那天只是阴历的十一月十七日。

看不到月亮、吃不上汤圆的元宵节当然也没有什么节日气氛，拥挤在路口围观的上海人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，观望的是无精打采的游行士兵而不是灯笼。

其实，比没有月亮的“元宵节”更大的问题早就来了。

数天前，上海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质疑的文章：“吾国颁行阳历于今一周，究其果能实行与否？

无论穷乡僻壤，即号称风气最开通之上海，犹未能占多数”。

1月2日孙大总统的改历命令刚刚颁行，3日的《申报》上就登载了这样的消息：“商界中人，咸以往来帐款，例于年底归来，今骤改正朔，急难清理，莫不仓皇失措，即民间一应习惯，亦不及骤然改变，咸有难色”。

与北京一样，上海商户们的银钱货物往来，凭的是交情与信用，常常是见货不见银。

等到阴历年关，再拿着账本一总结算。

本来还有一个多月才到结帐的日期，如今临时政府的改历令突如其来，商家们措手不及，放账的、欠钱的自然都急得如坐针毡。

鉴于民间抱怨之声四起，新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不得不下令，“沪上各商店往来债款，仍于阳历二

## &lt;&lt;民国元年&gt;&gt;

月十七号即阴历十二月三十日，暂照旧章分别结算收还，以昭公允。

嗣后如何酌定之处，候飭商务总长邀集各商从新组织办法颁布实行”。

上海为全国工商重地，其他省份原本对骤行新历同样诸多不满，自然会纷纷要求上行下效。

临时政府工商部只得随后发出通告，同意”以新纪元二月十七即旧历除夕，作为结账之期”。

有了主管机构和地方长官的亲口许诺，商家自然不再将新历放在眼里。

各个行业商会虽然遵令协调，但大多只是做些表面文章，老规矩仍然通行无碍。

唯独便宜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不法之徒，知道年关未至，还不起欠款的老百姓还没有离家躲债，正可以打着新历的旗号上门催逼。

更有某些居心不良的富户，在新旧历的时间差上打起了主意，收租之时做些手脚，”收进仍用阴历，付出则用阳历，按年计之，可便宜半月，所吃亏者贫民耳”。

《海上光复竹枝词》特意以较多篇幅描述了历法的突然变革所造成的困扰：”赖债无人不厚颜，动云除夕月中还。

今年恐亦难逃却，夜半犹存月一弯。

新历收钱到号头，商人欲改乏良谋。

倘然力矫从前俗，反说无钱任自由。

帐单一纸去纷纷，月底仍然大小分。

尚有一般常欠惯，不逢三节没分文”。

当然，这些钱物上的纠葛毕竟只是小麻烦，稍加调整便能解决，老百姓固有的习惯却非旦夕可变。

阴历之所以在中国通行千年，主要在于其上应天时，下洽人事，人们的秋收冬种、日常起居、婚丧嫁娶，无不与节气历法紧密相关。

至于端午、中秋、重阳这些令节，”小之为神话，为历史，大之则为文化之所等，非可根本抹煞者也”。

说到底，平头百姓和恽毓鼎这样的遗老毕竟不同，没有那么深切的家国之叹，之所以坚守旧历、冷对新历，无非是积年的习俗使然。

不过，在民国元年那个革故鼎新的特殊时期，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细节，也往往会与时代风云扯上关系。

”论者谓改用阳历，商人漠不关意，不曰顽固，即曰反对民国”；不支持新历就等同于不支持民国，历法上的新旧抉择，便如此顺理成章地逾越了习俗的范畴，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。

在坚定的改革者看来，”民间习惯虽不能一时改革，要当逐渐转移，新者即行，旧者自废，此天然之定理，况在国家正朔之大端乎？

”国家”正朔”是大道之所在，与此相比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只是小节。

在”大道”的影响和左右下，自然是必须做到”新者即行，旧者自废”的。

这就不难理解，为何自民国二年开始，有些地方官府为推行阳历，严令禁止民间过阴历新年。

这番强势干预的举动背后，显然有着自觉清晰的逻辑：”以为百姓如不过阴历旧年，即属顺民”。

为此政府制定了新规，要求机关、学校、报社等机构，只在新历元旦放假，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。

可除夕合家团聚的习俗实在不易改变，即便是鼓吹阳历最热情的《申报》，在旧历新年到来时，依旧”承社会之习惯，既停刊一星期”；上海、北京的各大报刊也莫不如此。

究其原因，也很简单，”惟旧习惯一时不能消除，印刷工人要求停工，送报人亦言不能分送”。

《大公报》则更为理直气壮，将停刊直接归因于传统的商业习惯：”即吾侪报界，既负有营业之职，自不得不服从社会，休刊数天，以为清理帐目张本”。

原该令行禁止的政府部门，同样在私下里阳奉阴违，阴历年节虽未停止办公，但常常是屋在人空。

就连参议院的会议也闹出了议员大量缺席的乌龙，”因人数不足，延期三钟之久，仍不能足法定人数”；只缘于当日是”阴历大除夕”。



## &lt;&lt;民国元年&gt;&gt;

同样被传统困扰的还有学校。

晚清的新式学堂依照习俗和节令，大多在阴历的正月和八月放假。

民国肇始，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，规定“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日（阴历壬子年正月十六日）一律开学”。

各级学校都据此制定了新的学历：3月4日至6月27日为上学期，8月28日至2月20日为下学期。

除了两个学期之间的春假夏假外，“又有年假者，以我国习俗相沿，在事实上颇难根除，仅以一星期为限”。

不过到了民国二年，由于强调“元旦”的正统地位，北京的学堂都取消了阴历年假，并派专员巡视督促。

当然，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：“惟各学生狃于积习，虽不放假，而告假实繁有徒”。

青年学生向来是破旧立新的拥护者，学校也被视为“社会观听所系”，可在与千年积习的较量中依旧败下阵来。

之后教育部和各级学校在学历问题上反反复复，着实费了不少周折。

或者将阴历年假更名为“寒假”，变相地放学生归家；或者从元旦之后便“只来校温习，不更授新课”，以敷衍这一个来月。

总之是不敢名正言顺地以过年的名义放假，以免背上了“守旧”的恶名。

尽管各地年节的习俗不一，但吃吃喝喝总是免不了的。

北方的民谚说“初一饺子初二面，初三的盒子往家赚”，事实上从腊八粥开始，直到正月二十五的“大填仓”，围绕着春节的这两个月，主旋律就是一个“吃”字。

虽然梁实秋对于正月里天天吃大锅的炖肉炖鸡甚为反感，对开胃的芥末墩儿、十香菜更有兴趣，但“孩子们盼过年”，盼的主要还是能放开肚皮大吃一番。

至于压岁钱、新衣服和各色新鲜玩艺儿，则为年节更添盼头。

由此不难想见，在过节的日子还要去学堂上课，对少年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。

浙江籍作家许钦文对此有一段亲身经历，当年他在省立五师读书时因正月初一返校而满腹委屈，如今的读者看来却十分有趣：“辛亥光复，民国成立，改用阳历过年。

当时我在城里的中等学校读书；学校里依照阳历放假，家庭中仍照阴历过年。

为着提倡阳历的过年，学校里于阴历过年时严格维持上课。

青年心理维新，对于社会习俗的守旧觉得可恨，记得有一年的阴历元旦适值星期日，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还有埠船，第二天没有开行的埠船，我和一个同学一直步行到校。

人在学校里上课，家中的年货吃不着，也觉得可恨”。

全城居民都在欢度佳节，除却交通不便的麻烦，想来学校饭堂的伙食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如此环境下上课，效果只怕未见得佳吧？

而对于老舍而言，早年担任国民小学校校长期间，无法陪同老母、让她独自过年的愧疚，几乎缠绕了他大半辈子：“新年到了，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，不许过旧年。

除夕，我请了两小时的假，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。

母亲笑了。

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，她楞住了。

半天，她才叹出一口气来。

到我该走的时候，她递给我一些花生，“去吧，小子！”

“街上是那么热闹，我却什么也没看见，泪遮迷了我的眼”。

显然是意识到了政令易下，旧俗难除，1912年1月13日，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内务部编印民国元年的历书时，便规定了三条重要的宗旨：一，新旧二历并存；二，新历下附星期，旧历下附节气；三，旧时习惯可存者，择要附录，吉凶神宿一律删除。

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，便是默许了旧历的存在，也同时埋下了“新旧二历并存”的伏笔。

只是如此仓促出炉的历书，错误遗漏之处甚多，应用起来更是诸多不便。

临时政府北迁之后，前清时负责编订历书的钦天监归属了教育部。

由于这个机构经验丰富，在民间也很有权威，很快便从内务部拿回了历书的编写职权。

## &lt;&lt;民国元年&gt;&gt;

由教育部颁行的历书修正了不少纰漏失误，但二历并存的格局依旧保留了下来。

可惜的是，&ldquo;阴阳合历&rdquo;非但没能调和新旧之争，反而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
在武汉，民众因为过阴历年时曾有&ldquo;严禁庆贺&rdquo;的命令，于是将端午节改在阳历5月5日，并准备按老规矩扎纸龙舟，巡游迎天神。

人们纷纷呼吁放假一天，军界更是要求上官按照前清时的旧例，打赏酒肉以示犒劳。

被鄂军都督黎元洪得知后，以&ldquo;改良社会、荡除民间之旧习惯&rdquo;为名下令禁止。

到了阴历五月初五，官家的禁令便不再管用了，政商各界按照旧俗互致庆贺，汉阳人则照旧将他们的龙舟摆上了长江江面。

上海则更为有趣，因不知道究竟哪个历的7月7日算是&ldquo;七夕&rdquo;，干脆新历旧历都算数，接连过了两个乞巧节。

为此《申报》特意刊发游戏文章，调侃人间的纷乱累得喜鹊两番筑桥，牛郎织女也可能因此误了佳期：  
：&ldquo;乞巧如今亦自由，推翻旧历逐新秋。

年年七夕双星会，偏把佳期误女牛&rdquo;。

为了讽刺新旧二历并存造成的混乱局面，《大公报》曾以拟人化的手法，将&ldquo;阴历&rdquo;

和&ldquo;阳历&rdquo;两位&ldquo;好友&rdquo;拉在一起相互较量。

由于之前的阳历新年过得还算不错，&ldquo;政府宴会欢舞，街市旗彩鲜明&rdquo;，于是&ldquo;阳历&rdquo;颇为自得地嘲笑起了&ldquo;阴历&rdquo;：  
：&ldquo;老阴啊，你看我姓阳的这二年时运总算不错，从前是官场里尊敬我，没想到今年商民人等，亦有恭维羡慕我的，总说是有人缘。

谁像你天演淘汰，为人不耻，再过个三年五载，恐怕消灭于无形&rdquo;。

&ldquo;阴历&rdquo;听了这番挑衅言语，&ldquo;将肚子气了个老鼓&rdquo;，但并未当场与对手辩驳。

等到数日后的阴历新年，&ldquo;街市的繁华，买卖的茂盛，人民的趋向，社会的习惯，较阳历新年热闹不止十倍&rdquo;，&ldquo;阴历&rdquo;方才趾高气扬地对&ldquo;阳历&rdquo;开火：  
：&ldquo;老阴啊，你前次吹说，我忍气吞声，并没还言，你看到底是你的年下热闹，还是我的年下热闹？

你的新年虽比我在先，注意的总出在少数，我的新年稍迟一点，作情的几满于通国。

我看你穿件文明新衣，既藐视同类，要论起支派来，我还许是你的老前辈哩！

&rdquo;虽然只是游戏文字，但&ldquo;老阴&rdquo;在和&ldquo;老阳&rdquo;的斗口中还是占据了上风。

因为在现实世界中，情况也确实如&ldquo;老阴&rdquo;所言：  
：&ldquo;第一年之改新历，盖曰仓猝未及预备也。

第二年之新历，则曰改习惯不易，将由渐而改也。

今已新历第三年矣，而起察人民之习惯，非但不如去年，并前仓猝而改之第一年而不若&rdquo;。

此后的若干年间，每当到了年头岁尾，&ldquo;老阴&rdquo;和&ldquo;老阳&rdquo;就会被人拉出来&ldquo;较量&rdquo;一番，似乎年迈的&ldquo;老阴&rdquo;次次都取得了胜利。

最终连政府也不得不向习俗妥协，&ldquo;尊重旧习惯&rdquo;，阴历新年虽然仍不准庆贺，但给假、加薪、停止办公的情形越来越普遍。

1913年第一个元旦过后，《大公报》曾就&ldquo;官厅热闹、民间冷清&rdquo;的场景发出感慨

：&ldquo;今年之新年，只可谓之官国二年，不可谓之民国二年。

以庆贺者只有官场，于人民无与也&rdquo;。

由于民国政府的极力提倡，曾经&ldquo;于人民无与&rdquo;的元旦，确实一年比一年热闹了起来。

在北京，每到元旦日，总统府门前便会张灯结彩，前门东西车站缀满电灯，放假的男女老幼结伴出游，东安市场里人山人海。

上海南京路的商铺在元旦也一律高悬国旗，停市休息。

向来做为官府礼仪之用的贺年片，也慢慢地成为了上海民间互致问候的新年礼物。

但在普通百姓的心中，这仍然是&ldquo;官家的新年&rdquo;，凑的也只是官家的热闹。

正如民间通称阳历为&ldquo;官历&rdquo;，阴历为&ldquo;民历&rdquo;，官派与民俗的分野，或许就是新历始终难以取得完胜的关键。

一言以蔽之，&ldquo;新历之新年，系政治之新年，旧历之新年，乃社会的新年&rdquo;，与民国的诞

## &lt;&lt;民国元年&gt;&gt;

生相伴而至的阳历，注定难以改变自身的官派色彩，&ldquo;可见政治之势力不及社会也&rdquo;。尤其是1927年后，迁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将元旦定为&ldquo;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&rdquo;，将阳历称为&ldquo;国历&rdquo;，更是大大加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。

与普通老百姓相比，知识分子对改历的态度更为坚决，甚至有人坚信&ldquo;本国国民不知奉本国之正朔，其为国耻尤大也&rdquo;。

不用阳历便是&ldquo;国耻&rdquo;，显然这些革新者与遗老恽毓鼎一样，都意识到了改历背后的政治因素。

事实上，在晚清西学观念的影响下，清政府也曾经考虑过改历，并计划在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&ldquo;改用阳历&rdquo;。

只不过随后武昌起义爆发，中华民国成立，改历已不再是内部革新的小事，而成为了新旧时代的分界线。

可传统的力量是持续而强大的，新旧的对立也并非想像的那么清晰简单。

&ldquo;你爱摩登，可遵新历；我是老朽，且从夏制&rdquo;，民国元年的历法变革，最终呈现出这般妥协的姿态，却是这个新旧杂糅的时代最合适的选择。

曾经被磕头拜年和火锅年菜所苦的梁实秋，1911年之后也终于解放了。

因为祖父母相继去世，早年在同文馆读过书的父亲领导了家庭生活方式上的维新运动，废除了过年的许多旧习。

梁实秋不再奉派出门拜年，母亲也不用再做年菜，而是改向致美斋定做，分装在圆笼中，除夕挑到家，自己只需准备一些新鲜蔬菜佐餐即可。

不用再磕头虫儿，也不用顿顿吃煮饽饽，梁实秋觉得这个新年实在大不相同。

当然还有没改变的，厂甸庙会的年俗并没有消亡，海王村和火神庙里依旧可买旧书。

小时候最喜欢的娱乐项目放风筝，在民国还是能够继续。

风和日丽的时候，在院子里一手扶竿，一手拿着线桃子，看着风筝冉冉上升，御风而起，虽然冻得涕泗横流，梁实秋仍然觉得，这个新年是最快乐的。

&hellip;&hellip;



## <<民国元年>>

### 编辑推荐

可感的历史——充分发掘小说中的历史素材，娓娓道来一个个生动的百姓故事，历史原来也是有温度，可感的。

新颖的角度——这是首部从百姓民生及其日常生活来反映清末民初社会的著作。

熟悉的场景——讲述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，比如怎么娱乐，怎么穿衣，等等，无不引起现在读者的遐想与共鸣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